

六十年代生人思想录

个人自由与 社会责任

Individual freedom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一种社会中间阶层的人生哲学

 中国出版社

王江松 著

我是谁 我该怎样做人

我可以期待什么

这是人生的根本问题

寻觅于自我与世界之间

往返于巅峰与深谷之间

徘徊于澄明与迷惘之间

啊 我独立于苍茫天地之间

悲情不禁涌上了心头

六十年代生人思想录之四

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

一种社会中间阶层的人生哲学

王江松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一种社会中间阶层的人生哲学 /
王江松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5
ISBN 978 - 7 - 5087 - 2583 - 3

I. 个… II. 王… III. 阶层—社会—职责—研究—中国
IV. D6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7404 号

丛 书 名：六十年代生人思想录

书 名：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一种社会中间阶层的人生哲学

著 者：王江松

责任编辑：张承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010) 66080300 (010) 66083600

(010) 66085300 (010) 66063678

邮购部：(010) 66060275 电 传：(010) 66051713

网 址：www. shebs. com. 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225mm × 153mm 1/16

印 张：19. 25

字 数：27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 00 元



《六十年代生人思想录》总序

六十年代生人的思想文化定位

我出生于 1963 年，今年 38 岁，已近不惑之年。

“文革”爆发那一年，我 3 岁；林彪摔死于温都尔汗那一年，我 8 岁；毛泽东逝世和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那一年，我 13 岁；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二年即 1979 年，我考入武汉大学，那一年我 16 岁。此后的岁月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成长的，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经常萦绕于我脑海中的一个问题是：20 世纪 60 年代生人，前与 40 年代、50 年代生人相比，后与 70 年代、80 年代生人相比，有什么联系和区别？我们这一代人能够给中国的历史奉献一点什么独特的东西？

—

四五十年代生人，年长者已届六十，年少者也已过四十。这一代中冒尖的人已经功成名就，活跃在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可以说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中坚力量和领导阶层。这一代中平凡的人，有的已经或将近退休，有的正被下岗失业问题所困扰，更多的正在过着一种小康或温饱的生活。他们比我们有更多的经历。他们经历了 1949 年国体的巨变，经历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和“三年天灾人祸”，经历

了四清、“文化大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他们正在经历这些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还没有出生，或者还是懵懂无知的小孩。如此复杂的经历，既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精神财富，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因袭和重负，有的人甚至已经被历次政治运动摧残得一塌糊涂了。他们当中有些人能成功地把苦难转化为财富，成为杰出的政治家、艺术家、思想家、企业家，但更多的人被磨平了、被酱染了，他们因此而消沉了、麻木了、认命了，随波逐流了。他们的热情几近消退，他们的壮志几近丧失，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几近泯灭。

与前辈们相比，我们 60 年代生人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苦难和折磨，也没有承受那么多因袭的重负。正好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进入了精神上的发育成长时期，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精神上的自我同一性，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我们虽然从时间上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或“文革”的中后期，但童年和少年强健的天赋、天真未凿的野性和调皮好玩的孩子气，使我们有效地抵御了来自“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伤害，甚至能够把成人社会一切血腥残酷的事件（比如武斗、批斗游街等）转化为儿童世界中欢乐的游戏节目。当我们进入成人世界的时候，恰好中国已经改革了，已经开放了。我们是改革开放的最早最直接的受益者。对老一辈来说，改革开放是一种补偿，是迟到的春天；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改革开放是净所得，是正逢其时的春天里盛放的似锦繁花。对老一辈来说，改革开放在给他们带来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某种沉重的压力，有些人甚至不能适应这一时代的潮流；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改革开放正好和我们内在本性要求相呼应，我们与改革开放就像鱼和水一样天然交融。我们这一代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完成了高等教育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到 90 年代末，已经开始头角峥嵘地涌现在中国社会的舞台上了。在我们当中，已有很多人 30 多岁就已经成了副教授、教授或处长、司局长，或身价千万的老板和企业家，而且在演艺界已占据半壁江山，在新闻界也纵横驰骋。我们这一代已开始各个领域摆开了与老一辈人一争长短、一竞高低的态势。



二

然而，七八十年代出生的更年轻的一代人紧跟在我们后面。如果说70年代初出生的人对旧时代还有隐约的印象和模糊的记忆的话，那么70年代末和80年代出生的人则一生下来就置身于一个新时代之中。别说四五十年代的事，就是“文化大革命”，对他们也只是一个遥远的故事而已。他们没有新旧时代的时差感和对比意识，他们只能从教科书里像认知其他陌生的客观对象一样去认知旧时代的历史。他们很少回过头去看过去，因为他们没有过去；他们一懂事就睁眼看世界，看未来，因为世界和未来仿佛天然地是属于他们的。

毫无疑问，新生代比我们这一代条件更好，机遇更多，也更有朝气，更有闯劲，更加自由洒脱，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大都是独生子女，世界一开始就是围绕他们转的；他们是吃着麦当劳和肯德基长大的，是穿着耐克牌运动系列和苹果牌牛仔系列长大的，是看着美国大片和港台影视剧长大的，是听着摇滚乐和港台流行音乐长大的，对现代、后现代文化有天然的亲和性和认同感；他们从小就受到正规的教育，高中的时候就学我们大学时才学的课程，上大学时外语就说得呱呱叫，计算机键盘敲得嗒嗒响，车开得溜溜转，在大街上和网络世界里都横冲直撞；他们一就业和创业就比我们当年起点要高，有的在校园里就开始创业，20多岁就成为网络英雄，身价成百上千万。

我已经深深地感到了我们这一代和新生代之间的代际差别，或曰“代沟”。最近，我重返教学岗位，回到阔别多年的讲台，接触的是一群十八九岁的男女青年。他们对我教授的政治理论课明显地不感兴趣，坐在后面的学生肆无忌惮地讲小话，根本无视我的存在。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课讲得深刻而又生动，并且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学生，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心不在焉、我行我素。这与我们这一代人迥然有别。我们那时候也不爱听政治理论课，不过我们不会在下面讲小话，我们只是静静地看小说，或者干脆不来听课而跑到阅览室去看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我们对老师的劳动和其他同学的听课权利还是相当尊重的。我们追求自由，但同时也知道自由的边界，那就是不去损害别人的自由。现在的学生怎么啦？我站在讲台上有些发愣，继而发火了。

我说我一直是把你们当作成人来尊重的。我承诺你们，如果对我讲的课不感兴趣，你们可以在下面看自己喜欢的书，甚至可以不来听课；我既不会用点名的办法把你们捆绑在课堂上，也不会利用考试来整你们，唯一的条件是你们不要在下面讲小话，而这是一个最低的、底线的、起码的要求，是人人都应该遵守的“课堂道德”。我曾经好几次向你们提出这一“君子协议”，你们都表示同意，至少没有公开表示反对。我还安排了专门的时间与你们进行现场交流和平等对话，而你们几乎没有人站出来发问。你们有谁能站出来有力地论证你们有在课堂上讲小话的自由和权利？如果不能，那么继续在下面躲在“群众”（一群人）之中讲小话的行为，以群体犯禁的方式来放纵自己的行为，从成人的标准来衡量，就是一种怯懦的、猥琐的行为，明显缺乏现代人所应具有的个体尊严和个体品位。你们在藐视我。然而请问，你们拿什么来藐视我？要藐视一个人，不仅要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具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而且要有资本和实力。你们有吗？也许你们将来会远远地超过我，不过你们现在只有一件应该做的事，那就是虚心地学习，踏踏实实地学习。

新生代有他们的优势，起码具有年龄、时间方面无可匹敌的、绝对的优势，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弱点。他们有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就像我们自己一样。

三

作为60年代生人中的一员，我想强调指出的是，我们这一代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能够把这一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我们一定能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作出独特的贡献，一定能够在历史上打下我们深深的烙印。

对于现代化，在中国的语境条件下，可以作如下粗线条的界定：经济的现代化，表现为工业化、知识化和市场化；政治的现代化，表现为宪政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文化的现代化，表现为从遵从传统到自主创新的转化，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化，从整体主义到个体本位的转化，从理想主义到世俗追求的转化，从重平等目标到重自由目标的转化，从强调责任到强调权利的转化，从人文知识和意识形态的话语霸



权到以科学技术为主流话语的转化。

对于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此处不加详论。我想着重谈论的是，在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中，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可能和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定位，可能和应该作出什么样的自觉选择和建构。

文化转型的战略有二：

其一，现代化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否定，也就是说，在继承与创新、一元与多元、整体与个体、理想与世俗、平等与自由、责任与权利、人文与技术等等相对的维度之间，既然传统文化过分地强调了前一个维度，那么现代化的第一步如果不能说是必然要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话，那么也至少应该着重强调和突出后一个维度。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要求达到这两个维度之间的绝对平衡与和谐状态的话，那么，后一个维度即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度缺乏的维度，就很难挣脱传统文化的格局而生长发育起来。而且即使有些从事文化建设的人能够在观念上以至行为上巧妙地达成两个维度之间的平衡与和谐，他们也不能甚至也无权阻止大多数民众按照自己的本能冲动和利益要求自发地趋向于后一个维度。因此，高扬创新意识、多元意识、个体意识、世俗意识、自由意识、权利意识、科学技术意识，应当是文化现代化的主要和迫切的任务。

其二，在承认上述这一战略的前提下，仍然不能抛弃“全面性”的要求，仍然要对传统有所继承和肯定，仍然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一元、整体、理想、平等、责任和人文这一精神维度，仍然要防止文化的转型完全抛弃这一维度而走向极端的反传统主义、相对主义、个人主义、世俗主义、自由主义、权利至上主义和技术主义一统天下的话语霸权。

如果文化的转型应当同时采用这两大战略的话，那么，我们60年代生人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就凸显出来了。

首先，与老一辈和新生代相比，我们更多地或更好地兼有新旧两个时代及其转换过程提供给我们的经历、思想资源和视角。与老一辈不同，我们幸运地没有被旧时代熏染、扭曲、压抑、败坏、残废，没有那么多因袭的重负；我们比他们更年轻、更有朝气，受过更好的教育，具有更多的竞争优势；我们与时代精神更为合拍，具有更大的创造性和开放性；对传统的、走向极端的一元论、整体主义、高调理想

和高调道德、平均主义、愚民哲学和意识形态霸权，具有更强的免疫力、抵抗力、批判力和否定力；我们要求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各个领域进行更彻底的改革和更全面的开放。如果说老一辈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主动地推进改革开放，而大多数人只是改革开放的被动适应者的话，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都是改革开放的主动的推动者。另一方面，与新生代不同，我们这一代人在旧时代生活过八九年到十七八年，我们挨过饿、受过冻，深知“贫穷的社会主义”的滋味。我们亲眼目击过旧时代的颠倒、荒唐、疯狂、残酷和野蛮；我们深知新时代的来之不易，感激先辈们为此而作出过的奋斗和抗争，同情他们为此而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我们赞成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而反对将传统一棍子打死和全盘西化；在弘扬多元性、个体性、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同时，我们依然保留对国家、民族、社会、集体的统一格局和整体利益的应有的尊重；在欢迎世俗化时代到来的同时，我们依然有对超越事物、永恒价值的终极关怀，依然有执著的理想和信仰；我们热烈地呼唤和争取更多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但我们依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追求社会的平等、和谐和公正；我们正在努力紧跟科学技术革命的步伐，努力适应信息爆炸和知识爆炸的时代，但我们也反对唯科学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而保留一种对人性、人情、人伦、人道的关怀。相比之下，新生代更加多元化、相对化、个体化和原子化，更加任性和无所顾忌，更趋于世俗、利己和自私，更趋于技术化、专业化和职业化。他们比我们要少一些对“全面性”的要求，少一些终极关怀和人文精神，少一些理想和信仰，少一些深沉和厚重，少一些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知。

其次，我们处身于老一辈和新生代之间，可以成为这两代人之间沟通 and 对话的桥梁和纽带，甚至能为这种沟通和对话建立一种平台。有趣的是，新生代从年龄上讲，正好是老一代的子辈，然而他们之间却有一条很宽很深的鸿沟。从年龄上讲，我们这一代相当于老一代的小弟弟，又相当于新生代的小叔叔，我们和这两代人都有亲近感和共同语言。我们在年龄上不构成独立的一代这一点，正好构成我们在精神上拉近前后两代人的优势，因为我们在精神上天生就是两维的，心灵的张度和包容性天生就比这两代人要大一些。通过我们，老一代可以更多地接受创新、多元、个体、世俗、自由、权利、技术的一维，



而新生代可以更多地接受传统、统一、整体、理想、平等、责任、人文的一维。通过我们这一代逐渐确立和扩大的话语权，我们有能力把老一代人的希望、愿望和要求传达给新生代，同时又能把新生代的欲望、冲动和热情传达给老一代。比如说，对于“大余小余”（余秋雨、余杰）之争，我们会有一个公允和持平的态度。我们不会像小余们那样，以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姿态去审判大余们，去强迫大余们进行忏悔。这不是因为大余们身上没有需要进行批判和反省的地方，而在于我们深切地意识到，我们自己，而且新生代本身，也都是有缺陷和毛病的人，都有无奈、屈服，以至软弱和怯懦的一面。我们没有权利作为“超人”去审判“常人”，去逼迫“常人”低头认罪。然而我们又激赏小余们的才气、透明、率直、个体担当精神和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冲劲，只是希望他们更宽容一点，更厚道一点，并且对自己也有一个客观的定位。

当然，我们这一代的优势也是相对的、有限的。老一代中也有许多人如凤凰涅槃一样地得到再生，尽管他们比我们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和更大的代价。新生代中也会有许多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尽管他们肯定要在经历很多的片面、偏激、极端、混乱、迷茫、颓丧以至疯狂之后，在交付了足够的学费之后才能达到这一点。我们这一代固然比老一代轻松和幸运，又比新生代健全和冷静，不过我们也许会走向平庸的全面、勉强的综合、无原则的妥协、没有个性的调和、没有独创性的中庸之道。这正是我们这一代最大的危险所在。

四

《六十年代生人思想录》收入了我于1981年至2003年期间的主要作品，时间跨度达20多年，真实地记录了我这个60年代生人的精神成长历程。这一历程刚好与中国的思想解放、文化转型和改革开放过程同步。因此，如果说这些作品的思想价值有待于读者和时间的评判的话，至少，它们的社会学、文化学和历史学价值是无可置疑的。

首先，它们记录了一个60年代生人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出发，走向更广袤的精神世界并在其中寻找自己位置的过程。我们这一代人，同老一辈一样，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构成我们的知识

基础和精神背景。在厌弃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后，我们如饥似渴地寻找“真正的”马克思。我们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读了一遍又一遍。针对有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打人的棍子、整人的工具和另一些人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极端的倾向，我发了一个宏愿，要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真的用两年时间完成了这一工作。我在通读全集的过程中，发现了无数被人有意无意地丢弃和遗忘的珍宝。根据我们这个社会的特点和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我力图重建一个我自己的马克思，力图让马克思主义获得一种现代的阐释和扩展。在这个基础上，我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诸种学说进行对比研究，使之在一种开放的格局中取长补短。

其次，它们记录了一个60年代生人如何吸纳西方文化并力图使之本土化的过程。八九十年代，中国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西学热，遍及各个学科和文化分支的西学经典被译介进来，令人惊喜交加、目不暇接。四五十年代生人完成了译介西学的大部分工作，而直接受益和最大受益的莫过于60年代生人了——译者成年累月才能译出一本书，而我们在一个月內就能阅读十几本他们译出来的书。经过了一阵狼吞虎咽之后，我深深地感到了消化和吸收的必要性，感到了对西方文化进行本土化的极端重要性。如果不能将西方文化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进行有效地对接，再优秀的外来文化也不能变成中国人内在的东西。而精通西方文化的饱学之士，也只能始终“生活在别处”，而不能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国的现代化，迫切需要建设一种本土性的现代文化，迫切需要诞生出一批能够与西方思想界平等对话的本土思想家。

再次，它们记录了一个60年代生人如何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坦白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知识结构有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80年代我们基本不读老书，一是因为没有时间读，二是认为不值得读。从90年代起，我有意识地补这方面的课。我认为，即使从吸收西方文化的角度而言，也有必要深入了解传统文化，至少，中国仍然有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传统文化之中。全盘西化不仅是不应该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之所以说不应该，乃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许多宝贵的因素和遗产，可以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全盘抛弃和推倒传统文化是鲁莽灭裂、愚昧



无知的做法。之所以说不可能，是因为中国人无法以一块“心灵的白板”接受西方文化，他们必然要从自身的传统出发去阐释和选择外来文化。试图全盘遗忘传统文化和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犹如想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到空中一样滑稽可笑。从这个观点出发，我尤其重视挖掘传统文化中长期被压抑、禁锢的非主流文化、异端文化、边缘文化、亚文化，比如中国古代那些“文化畸人”的个性思想，明清以来初露头角的商人文化，以及作为“元文化”、“隐文化”而存在于中国劳动人民身上的、任何一种“显文化”都无法窒息的坚忍、勤劳、正直、善良的精神品质。我认为这些文化因素具有深刻的现代价值，完全可以成为与西方优秀文化的对接点。

以上线索构成了我和我的同代人精神历程的经纬线。正当我按这种思路奋力去完成那“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且于1990年写成了第一部哲学专著《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时，我却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精神危机。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江郎才尽之感，我突然对漫长枯燥的书斋生涯感到厌倦和绝望，我悲哀地看清了纯知识分子软弱、可怜、无助的真实处境。经过了长达三四年的反省、犹豫、痛苦的内心挣扎和心灵搏斗后，我终于跳出了长年留恋的书斋和苍白单薄的纯精神生活，于1994年下半年下海经商。我要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我要作为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找到自己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我要寻找认知世界的新的“视角”和“范式”。我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生存论和知识论上的转换：在我封笔10年后回到书桌前重新写作的时候，我已经不再是作为一个书斋学者、一个学院派知识分子、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纯知识分子来剖析社会、历史、人生了，而是作为一个直接的社会存在主体和社会中间阶层知识分子来看问题了。我坚定地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西方文化的本土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要想真正成为“社会的良知”，就必须首先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必须获得自己独立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地位，必须成为社会中间阶层的一部分和中坚力量。

读者如果有兴趣看完《六十年代生人思想录》，也许会对“60年代生人的思想文化定位”这一社会学、文化学和历史学问题，有更为具体而亲切的了解。考虑到60年代是我国著名的人口生育高峰期，这10年间出生的人数有两三亿之巨，而再过10年，这一代人将全面入

主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对中国的制度、法律和道德建设，对中华民族新型文明的建构，施加巨大的影响，全方位地认识和研究这一代人，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和有价值的课题。

我当然期盼着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在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事业中作出独特的贡献，并为我们的后代人创造一个更宽广的平台和更开放的社会结构。

王江松

初稿于2001年10月18日

定稿于2009年3月12日



目 录

《六十年代生人思想录》总序	(1)
---------------------	-----

上 篇 我 是 谁

“我是谁”的问题是人生哲学的出发点	(3)
我不是什么人	(6)
我是社会中间阶层知识分子	(26)
我是农民的后代	(32)
我是中国人	(38)
我是自然与人类之子	(43)
我是脚踏实地的自我实现者	(49)
我是悲剧人生观的倡导者	(57)

中 篇 我 该 怎 样 做 人

做人是一件艰难而美好的事情	(69)
成为自己与承担角色	(74)
做人与处世	(79)
中心与边缘	(82)
人在边缘	(91)

	如何经营人生	(98)
目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与知其可为而不为之	(106)
	有所得必有所失与有所失必有所得	(113)
录	伯乐相马新释	(116)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重释	(121)
	“任性”、“纵情”重释	(125)
	“自私自利”、“明哲保身”重释	(128)
	“飞扬跋扈”、“不可一世”重释	(135)
	天人如何合一 人人如何合一	(139)
	先人后己可行吗 舍己必定利人吗	(144)
	公正必须无私吗 无私就会大公吗	(148)
	是大河无水小河干吗	(155)
	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有功于社会	(157)
	为什么要帮助他人	(161)
	怎样帮助他人	(165)
	助人之心、防人之心与适当的人际距离	(170)
	公民与公共生活	(174)

下篇 我能成就什么

生命的价值或生活的意义	(183)
何谓成功和幸福	(189)
如何兑现善恶有报的伦理承诺	(196)
也说成熟	(206)
追求完美的风险	(213)
我无力也不想让所有的人都满意	(220)
低调的希望	(224)
简朴的丰富	(233)
宽容的权力	(246)
寂寞的声望	(257)



满头白发与永远年轻的心	(270)
恐惧死亡与从容赴死	(276)
离开人世前应偿还所有的欠债	(282)
后 记	(287)
王江松作品一览	(290)

上
篇

我
是
谁